

郭绍虞的六朝文论书写

贺根民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整体统摄六朝文论史料,以科学求真的态度,践行以问题为纲的文论书写模式,全面体认六朝文论的重要地位,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六朝文论书写,不仅表明早期文学批评史的探索实绩,亦绘制了民国学者系统整理旧学和积极吸纳新知的时代镜像。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郭著的经典地位,显示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的现代转换。

关键词: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六朝文论;纯文学观;批评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3-0086-06

汉帝国的落日最后一抹余晖逐渐消逝,魏晋六朝的文化天空便弥漫着一阵清新脱俗的自然之气,中华大地驰入一个政权变换频繁、思想异常活跃的文化转折时期。奔突不息的玄学思想冲刷着儒学传统的堤坝,导致自由精神的大面积泛滥。传响久远的魏晋六朝审美风尚引领后世文人追步寻踪,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人的郭绍虞先生,整体统摄六朝文论史料,以科学求真的态度,践行以问题为纲的文论书写模式,全面体认了六朝文论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后来的批评史书写创建一个堪可效仿的书写范式。

一、科学的论断:历史文本的客观认知

草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撰离不开西学的烛照,文化他者的异域之眼为国人提供整理旧学和检讨传统的崭新向度,20世纪初发轫、20世纪20年代蔚为风潮的“整理国故”运动以输入学理的自觉来谋求再造文明,重估一切价值,寻觅中西文化融合的有机生长点。“整理国故”运动加快了国人接受科学方法的速度,该运动的旗手胡适一生都在倡导和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系统整理中国“支离破碎”的旧学,他认同的科学之道就是“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1]。草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撰者,像陈钟凡、郭绍虞均对科学方法持欢迎态度,并以此来整理国故,他们的批评史编撰就是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亦为旧学系统化的一类范本。郭绍虞素来关注六朝文论,在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中,他盘点古代文论的丰富遗产,即以六朝文论典籍来说事:“仅仅在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的三百年间,就出现了《典论·论文》那样的作家论,《文赋》那样的创作论,《文章流别论》那样的文体论,《文心雕龙》那样系统的文学理论,《诗品》那样的诗歌论以及声律论等等。它们是如此地丰富多采,简直是同时期的西方所不能比拟的。”^{[2]421-422}在其看来,六朝文论典籍是彰显民族自信心的一个重要依仗,也是建立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组成部分。1931年在燕京大学,郭绍虞曾为研究生开设“陶集之研究”的课程,讲授陶渊明之个性、文辞及其渊源影响。郭绍虞有诸多研

收稿日期:2015-02-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研究”(12YJA751021);广东省高校人才引进项目“现代文学中的魏晋文化书写和接受研究”

作者简介:贺根民(1971-),男,湖南邵东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

究六朝文论的专题论文,像解放前发表的《〈文章流别论〉与〈翰林论〉》、《文笔与诗笔》、《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永明声病说》、《文气再辨》、《从永明体到律体》,解放后亦有《关于〈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及其他》、《试论〈文心雕龙〉》、《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关于〈文赋〉的评价》等论文,它们连同旧版批评史中关于六朝文论的专篇论述,书写了郭绍虞诗学理论的魏晋六朝情结。

文学传承,代有所尊,一代有一代之文论。六朝文论作为一个历史文本,缘于其对辞藻的推重而常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滋生种种认知误区。旧版批评史载:“南朝的文学批评,如此重要,而昔人每忽略之,则以此期的创作界在文学史上是极端偏于骈俪的时期。而此期的文学批评,亦不免较重形式方面,——如音律与采藻的等等问题,均为本期批评界所集中讨论的。因此,本期作家的作风,既遭后世古文家或道学家的攻击反对,则此期较重形式方面的文学批评,当然也易于遭人轻视了。”^{[3]97}藉以现代学术视野来发掘六朝文论重要地位,廓清认知误区,存其本来面目,这是郭著体认六朝文论的一个基本观念。左思作《三都赋》,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其《三都赋序》载:“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郭著疏之云:“他这样定诗赋的区别,似乎有些不甚妥当,若欲使其赋成为一子之学则可,若欲其文学批评也取‘疾虚妄’的态度则可。如果此意不足以范围赋的全体,则因于‘升高而赋’一语而必求其赋之翔实,未免太偏极端了。”^{[3]85}诗歌本为吟咏情性的产物,赋则讲究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相对而言,诗歌重在抒发情感,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自汉到魏晋,对采藻和音律的讲究,打造了赋的美丽之文形貌,然左思论赋,偏向情实一隅。郭著认为左思作赋求真的理念未能彰显诗赋之别,这就展示重估文学命题的科学态度,亦侧面流露了审视方式的现代色彩。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风向标,魏晋六朝的以品论诗,蔚为一时风潮。即便在当下严流品而不专清议的整体文化生态之中,郭绍虞细细爬梳,认为梁代就是一条分水岭:“我以为齐、梁以前政治风俗上之批评虽盛,而文学上之批评犹未盛;政治风俗上之批评重在矜门第,而文学上之批评犹不显优劣。直至梁时,始会合此二种批评风气而为一,于是才有不必以作者自任的批评家。”^{[3]105-106}人物品藻所显现的社会选择机制,在早期带有浓郁的政治性特征,只是后来呈现人格化和自然化的趋向,其审美属性才得以确认,人物品藻彰显了古代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郭著例以钟嵘《诗品》与曹丕、曹植文学观的对比,根植于文学批评史观,梳理六朝批评方式的细微差别,凸显了文学本体地位。他推崇梁代的纯粹文论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认了现代纯文学观。

文论书写是一项与古人结缘的工作,在政教中心论高唱入云之际,六朝文论的审美特质长时间地被人忽视或歪曲。六朝文学书写中对人体美的关注、对辞藻的追逐,每每为后人诟病。浸染儒家思想,传统文学往往呈现重质轻文的倾向,为了明确地分梳六朝文学创作与文论倾向的差异,郭著常常援引现代的文学观念,进行科学的论断:“昔人之论南朝文学者,每议其淫靡而远于情性,实则由当时一般的作风而言,或不免多犯此病。若由当时一般的作风而言,则外形、内质同样重视;或且欲矫正一时风尚之故,转有较重于内质的倾向。于此,可知南朝批评家之深切明了文学之含义与性质。”^{[3]110}文学创作追求丽辞彩句,文论叙述则不乏对文质的关注,《文心雕龙》屡申为情而造文之旨,《昭明文选》奉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即为注脚。这样,标举文学观念的现代趋向,全力凸显南朝文论的重要地位,它就并非一项简单的以正视听的行为了。南朝是大倡音律的时代,沈约以平上去入四声制韵,推动诗歌由永明体向律体演变。郭绍虞盘点诗歌音律的发展流变,探明音律之于文辞的作用,并认为它诚为中国诗学不可避免的一环。其云:“我并非忽视文艺上的自然美而重视人工美,不过我们对于沈约、钟嵘,实无所用其左右袒;而且就于中国文学的特性而言,觉得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为不可免之事实耳。”^{[3]140}文学演变有其相对自足的空间,音律自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并且有术可循,沈约本人就不满于自然音律而心仪人工音律,凸显南朝文论的技巧特质。音律的讲究一显于六朝,至唐代转为近体诗,更有广阔的发展天空,它并不因为个体的好恶而改变。郭绍虞不以拘忌真美而埋没音律说的价值,在保存古人面目的基础上客观体认,反映了文学批评史观的科学色彩。

二、以问题为纲:文论书写的新范式

中国史书的书写范例基本上不出以人物为纲的纪传体、以时代推移为序的编年体、综合二者的纪事本末体三途,以问题为纲,在枝枝节节文论史料中理出某一(类)文论问题的清晰演变脉络,然后逐个对问题进行分析解决,整体统摄问题的因果联系和前后脉络,这是郭绍虞宏观审视、有效突出问题意识的一种编排方法。旧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的《总论》载:“本书上卷所述,以问题为纲,而以批评家的理论纳于问题之中,即于刘勰、钟嵘诸人,犹且不为之特立一章。至本书下卷所述,恰恰相反,以批评家为纲而以当时的问题纳入批评家的理论体系之中,即因当时的批评家能自成一言之故。”^[4]如其所论,旧版批评史中的六朝文论和清代诗学无疑是以问题为纲编排法的典范,或以人分、或以时代为序、或以问题为纲,文论书写的原则展示了郭绍虞的胸中擘划。其实,旧版批评史上下卷看似凌乱的编排方法,何尝不隐寓郭绍虞积极探索文论书写新模式的雄心呢。郭绍虞钟情于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凸显学术识见,在推举南朝文论的重要地位之时他就直接以此为度:“其所以重要的原因,由于(1)所讨论的问题,空前绝后,不囿于传统的思想,而能范围后来的作者,指导后来的批评家。如文笔之区分,如音律之发明等等,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3]96}聚焦于一、二个核心问题,既上接秦汉文论,又伏下唐代文论改弦更张的契机,引领后世批评的基本理路。朱自清检点草创时期文学批评史学科有二难,其一是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披沙拣金;其二,“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5],而建立一个彰显批评史学科独立自足的体系则尤其困难。郭著的问题编排法就是尝试建构系统的实践,它树立后世批评史书写的新范式。

王运熙在郭著《前言》中推举郭著的榜样效应:“著者在论述一些批评现象时,往往在纵向上注意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在横向上注意同时代文论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涉及背景时又注意说明文论与文学创作、哲学思想的关系,凡此等等,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历史线索和图景。”^{[3]3}郭著的六朝文论书写正是这类“图景”具体而微的反映,他藉以文笔之分、音律诸问题的发掘和分析,树立问题史的书写典范,从而形成对六朝文论全面而深刻的透析。推源溯流、寻其本质,郭著往往以一些核心问题来统摄小问题,左右延展,在问题分析之时秉持历史主义视野来获得研究的纵深感。譬如其论述南朝人的文学观念,就从形文和声文、情文、风格、体制、文笔之别等不同侧面来彰显南朝人的文学观念镜像。他盘点了南朝文学批评的几个核心问题:“在此时期所提出的问题,有值得注意者,即为(1)音律说,可以沈约为代表;(2)历史的观念,可以钟嵘为代表;(3)文与道的问题,可以刘勰为代表。”^{[3]127}核心问题中又包含诸多次核心问题,然后辅以代表性的文论家及其文学观来充实拓深。像郭著在分析《文心雕龙·时序》的文学史观和钟嵘《诗品序》的五言诗演变史观之时,并不将文论跟文学史混为一谈,而侧重发掘文学史论述所孕育的问题:文学进化的观念、文学流别的窥测,尽力凸显问题意识下文论书写特质。南朝人论文,主张新变,由新变而生复古思潮,开唐人复古运动之先声,如此书写彰显了历史主义视野下的问题挖掘深度。这样,将相互影响问题组合成一有机系统,而不过分萦绕于某些历史细节的考证,在书写中开辟一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论述理路,有利于展示著者的理论建构的高度和论证问题的深度,标举文论书写中独具特色的问题型阐释话语。

以问题为纲,显示了郭绍虞宏观考察和整体统摄文论史料的学术实绩和学术识见,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批评史书写模式。但是,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势必会遮蔽文论史那些文论大家的光辉。这一不足已被董乃斌先生指出:“应该承认,郭绍虞《批评史》编排法缺点是明显的。第一,不易突出某些地位重要的批评家和理论著作。如郭书不为刘勰、钟嵘设专章,即为人诟病,而后的《批评史》几乎没有不为他们独辟专章详加论析的;第二,按问题论述必然使某些批评家被分在几处介绍,这样就割裂而难见全人。”^[6]先提炼问题然后论断,旁及其前因后果,有利于在繁复的材料中理清一条清晰的文脉,亦显示编写者的宏观驾驭能力。不为刘勰等文论大家设置专章,而服从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可能应

是他考虑问题的一个基点。1956年郭绍虞《关于〈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及其他》有一清晰的陈述:“正因《文心雕龙》的宗旨是重在‘弥纶群言’,所以我于《文心雕龙》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也就可以把它纳入南朝文学批评中所提到的各项问题中去。”^[75]至于涉及哪些具体问题,郭文进一步细化:“我在‘南朝作家对文学的认识’一章中,在‘从文体的辨析到文笔的区分’一章中,在‘风格与神气’一章中,在‘永明体与声律问题’一章中,在‘历史的批评’一章中,哪一章不提到《文心雕龙》,哪一章不给《文心雕龙》以较高的评价。尤其重要的是在‘通变问题’一章,这是就刘勰继承古代现实主义理论的通变之说特别提出来讲的。……要研究一部书,必须掌握它的总的精神,要批评一部书,也必须明白它的著述体例,这似乎是起码的条件。”^[76]显然,郭绍虞并非漠视刘勰等文论巨匠的文化地位,戛戛独造,标举“总的精神”,盖其胸中另有擘划,不无几分对问题编排法的自许和自矜之情。

三、纯文学观趋向:文学独立性质的发掘

纯文学观是艺术自律论的突出表现,是西学烛照下现代审美精神的形象反映,它解构了文学依附经学、哲学卵翼下的夹生状态,形成对传统“文以载道”观念的反动,从而以独立自主的艺术品格获得身份标识。1905年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最早亮出“纯文学”这一观念:“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蕙然听命于众故也。”^[8]旁借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维,展示国人感应异域之学而孤独的理论先觉姿态。而后1907年鲁迅《摩罗诗力说》推崇兴感愉悦的美术本质,一道加深国人视审美为文学本质的观念认知,1921年周作人的“美文”倡导及其纯美的散文创作标领了20世纪20年代的纯文学运动。纯文学观的文化指涉凸显精神的自由向度,其审美超越性改写了文学书写的原则和文学批评的标准。郭绍虞在《艺术谈》这一长文中就流露其追步纯文学观的痕迹:“诗本是感情方面的产品,比较的不重理知。”^[2119]其1927年的《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一文侧重历史演变角度来辨析文学的准确含义:“盖两汉以前之所谓‘文学’,是从学的观点说的;南朝之所谓‘文学’,是从文的观点说的。若明白这二点,则知六朝在文学批评史上之重要贡献,不仅如阮元所云只在‘文’‘笔’之分了。”^[9]两汉以前,文章与学术不分,文学往往杂有博学之义,两汉时代,文学偏指儒学和经学,文章则为辞赋的代名,迨宋文帝刘义隆立四学,文学别立于学术之外,文学才获就独立的存在价值。六朝儒学失范,开拓了个人情思表现的广阔天地,其文笔之辨本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纯文学观,却因为后世过分萦绕于道德事功而中途夭折。南朝文学观近乎民国文人对文学的纯美发掘,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的体认,在现代的文学书写和文论编撰上获得大面积的绽放。

凡事皆有因果,文论书写大致有一个前后沿袭的书写理念,郭著以情感、想象为文学的内质要素:“热情腾涌而喷薄出之以流露于文字间者,当时的批评家往往称之为性情或性灵。这是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情感。”^[3110]考察的视角侧重文学的内质而非外围,彰显了著者扣住文学本质而申发的纯文学取向。魏晋六朝在郭著中被认为是演进期,其所述问题的细致化倾向确立了文学的独立性质。相对而言,文人身份的变化,特别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家的出现确立了文学书写向内转的文化趋向:“不同曹丕、曹植一样以作家兼之,所以所论的不仅润色改定的问题,而重在建立文学史上的原理和原则。又不同王充、葛洪一样以学者兼之,所以所论的不偏重在杂文学的方面,而很能认识文学的性质。”^[3196-97]基于对文学本质的发掘,南朝人所树立的文学原理和原则,其本身就带有重估历史的意味,就此而论,民国初期学术界的文化运动可谓南朝的隔代嗣响。南朝不过二百年的时光流转,文论巨典的诞生、批评方法的多样性、种种启领后世的问题讨论、纯粹批评家的出现,它们一道打造了南朝文论的学术高峰。后世文人斤斤于南朝文论的骈俪之风,指责其脱离了“文以载道”的轨辙,恰恰反面递送了南朝文论的纯美色彩。郭著所推举的文论认知方式隐隐不以曹丕、曹植的观念为度,亦非王充、葛洪的那样。

以前者而言,曹丕《与吴质书》主“辞义典雅”之论、曹植《与杨德祖书》倡“定仁义之衷”之见,大体未出儒家的传统论调,亦为后世“文以明道”的先声;王充《论衡》的“疾虚妄”之旨、葛洪尊子书而忽视文艺之道,他们虽不以文章为德行之余事,主张今胜于古,然仍多以实用眼光来考察文学,多偏向于杂文学一途,仍未脱学者论文的笼盖。

纯文学观并非视文学为政教治心、范围人伦的工具,而是以其审美指涉获得独立的存在价值,它属意情感的表现力度和追逐适当的形式美学。就此而论,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之说和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关合了文学的本质规律,形成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化镜像。六朝人竞逐绮丽文字,固为其文学修辞技巧的题中应有之义,自有历史和时代的原因。郭绍虞的旧版批评史藉以曹丕《典论·论文》的四科八体之说,“更看出诗赋之欲丽,以见纯文学自不可废去修辞的技巧”^{[3]74},而陆机《文赋》就天才、情感、想象和感兴的精微分析,也“道出为文之甘苦,颇能攫住文学的要领”^{[3]79}。郭著侧重文学本体因素而发的书写模式,也就从文学观念源流中抓住六朝文论的根本。职是之故,即便是南朝人的藻饰之风,也不无启领后世的存在意义:“我们须知:(1)因骈俪之重在藻饰,故其作风当然较偏于艺术方面而与道分离;因此,反容易使一般人认清了文学的性质,辨识了文学的道路。由这一点言,觉得后世文人之论文,反多不曾认识清楚者。”^{[3]97}文学创作的繁荣,引发批评家去瞩目丽辞彩句,加宽了文对道的疏离幅度,这势必彰显文学的独立性质,又适为南朝文学突飞猛进的内在原因。大体而言,文笔之分中的“文”偏重于纯文学,其他如行文和声文、情文、风格诸元素亦包含一个注重藻饰的纯文学批评标准。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在纯文学观盛行的南朝文学批评界,道德实用话语并未全部退出市场,即使是主纯文学观的昭明太子萧统和梁元帝萧绎各自在《陶渊明集序》和《金楼子·立言篇》的话语申发就偏向儒学伦理一侧,偏重于“笔”的维度,开唐人文学复古的先机。郭著扣住文笔之分,细细爬梳,问题越分越精,文学性质愈辩愈明,他不但勾勒文学的进化之迹,也见出自战国至南朝文学独立性质的发掘历程。这样,郭绍虞运用新学理整理旧学,获就了解问题的有效路径。

四、结论

拓学术之区宇、示来者以轨则,郭绍虞的六朝文论书写胜义纷陈、淹贯精审。他尽可能还原六朝文论原貌,科学地论断和认真地取舍,科学意识、问题编排法和纯文学观搭建起郭著六朝文论的书写图像,郭著认可魏晋文学自觉说,客观发现六朝文论的存在价值,一新世人的眼光。他侧重文学本体来凸显六朝文论的传承意义,精细分析文笔之辨的文化含义,在文学进化论的基础上树立纯文学的考察视野,进而整体统摄和客观论证,标举了六朝文论书写中颇具特色的“郭绍虞模式”,它是郭绍虞六朝情结的具体显影,也绘制了民国学者系统整理旧学和积极吸纳新知的时代镜像。知识谱系的转换呼吁书写理念的更新,郭著的六朝文论书写,不仅表明早期文学批评史的探索实绩,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郭著的经典地位,显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的现代转换。

参考文献:

- [1]胡适.胡适文存:第二集[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1007.
- [2]郭绍虞.照隅室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
- [5]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40.
- [6]董乃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C]//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99-300.
- [7]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下转第103页)

人。他的词既有才子词人的慷慨悲歌,又有爱国志士的抗日壮歌,形成雄奇健婉的艺术风格。他的词富有哲思,多有对人生哲理的探讨。国变之后,他辱忍负重留在北平,词作中饱含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反映了民族的危机与必胜的信念。在其同时代的词人中,顾随先生是一位佼佼者,在词史上也是一位成就卓然者,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读和重视。

参考文献:

- [1]顾 随.顾随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李 云.试论顾随对王国维词的继承和发展[J].泰山学院学报,2010(4):70-74.

On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Gu Sui's Ci

Li Yu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Gu Sui not only had wit poet chant in a heroic mournful tone, but had patriot Anti Japanese song, written patriots by lady image, used graceful pen expression blending , faithful faith, formation of magnificent and graceful, philosophical, full of worry artistic style. His Ci was philosophical, and had much discussion on "heart" and the philosophy of life thinking. After the July 7 Incident of 1937, Gu Sui swallowed humiliation and beard a heavy load. He stayed occupied Beiping.His Ci was full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s worry, reflected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the belief of motherland to win. In his Ci, we could see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the reign of terror, and could see the back of Kuomintang government hastily fled to the Chongqing.

Key words: Gu Sui; literature and society;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patriotic feeling; history of Ci poetry

(责任编辑 王 作)

(上接第 90 页)

- [8]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102.
[9]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98-99.

Guo Shaoyu and His Writing About Literary Theories on Six Dynasties

He Gen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China)

Abstract: Clearing up the whole historical literary on six dynasties, he fulfilled a writing mode as the problem for the key with a scientific attitude, who overall realized it important for him to awareness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the six dynasties, the writing in the criticism of Chinese literary by GuoShao-Yu didn't only indicated achievement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also mapped an image that the scholars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organize tradition and to recruit new knowledge actively. To some degree, it supported its classic status of the books by Guo,which showed a modern transi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Guo Shaoyu;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ry theories on six dynasties;pure literature view;study of criticism history

(责任编辑 王 作)